

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区域分工抉择

聂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00102)

提要: 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 通过分析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 论证了劳动分工、制度供给、交易费用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内生关系。作者进一步运用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应选择的最优分工网络, 从而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新兴古典经济学、劳动分工、区域经济

1776 年,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发表的宏篇巨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按照斯密的本意, 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 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 (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 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 (Alfred·Marshall) 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 用效用函数和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 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 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本文所要揭示的, 正是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

本文结构做如下安排: 第一部分综述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 指出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 第二部分运用模型证明几个劳动分工方面的定理; 第三部分将这些定理应用于区域劳动分工模式的抉择; 最后是小结以及本文结论的推广。

一、新兴古典分工理论

1、综述¹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篇就谈到劳动分工。斯密认为,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构。” (第 5 页) 斯密说, 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 第二是减少了工种的转换成本; 第三是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关于分工的决定因素, 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 分工的程度, 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 换言之, 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1 限于篇幅及作者能力, 本文不打算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做详细介绍, 感兴趣的读者可登录相关网站 (<http://www.inframarginal.com>) 查看。

（第 16 页）。斯密虽然洞见了劳动分工对增加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却未能深入地论证市场是如何决定分工的。

阿伦·杨格在其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Young, 1928）中对斯密的思想进一步深化。杨格认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递增报酬是这一关系的基本特征，递增报酬依赖于劳动分工；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在论及分工的决定因素时，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这样，便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杨格关于劳动分工水平自我演进的思想被认为是“杨格定理”。杨格深刻地指出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但对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原因却缺乏有力的证明。

此后，舒尔茨（Schultz）、霍撒克（Houthakker）、贝克尔（Becker）、杨小凯、黄有光、史鹤凌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杨格定理进行扩展或深化。本文摘要评述贝克尔和杨小凯的观点。

贝克尔在与马瑞普合作的一篇重要论文（Becker and Murphy）中指出，市场规模固然对劳动分工有决定作用，但更重要因素是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和“通用知识”（general knowledge）。贝克尔和马瑞普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达到均衡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和马瑞普用“协调费用”和“通用知识”两个因素来描述分工的决定因素，但却没有处理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文中实际上只承认了“协调费用”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协调费用”不足以概括发生在市场上的全部分工费用。

杨小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集大成者。杨认为，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会上升，反过来会扩大交易规模，因而提高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均衡分工水平（杨小凯，1997，第 13 页）。杨的重大贡献主要是将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正确地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1998，第 10 页）。杨所指的分工费用应该是包括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和空间距离造成的耗费两部分，杨并认为它们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而交易效率由法律制度或城市交通的改变外生决定。杨小凯首次用数学模型发展了杨格定理。然而遗憾的是：（1）认为交易效率决定交易费用恐怕是不正确的。交易效率是单位时间内成交的次数，而能否成交、成交的次数在给定交易好处的前提下，应当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因此，是单位商品的交易费用决定了交易效率，而不是相反。（2）杨声称，在他的模型中交易效率是内生的，但即便是在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1998，第 480 页），交易效率 k 也是一个“与制度环境或交通条件有关的参数”。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环境和交通条件呢？杨的模型没有明确说明。

事实上，由于距离造成的交易障碍也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而交易费用是由制度供给决定的，制度的形成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过程（林毅夫，1994）。给定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人口、政治参数及资源的相对价格，新制度的供给就是一个制度创新收益与成本的问题。收益往往是事前变量，随分工水平而递增，起决定作用的变量主要是成本，即交易费用。这样，决定分工水平的交易费用经由“制度供给”这一变量而完全内生了。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产生递增报酬，推动生产力水平上升，增加了制度供给的收益，并进而经由市场这种组织结构进一步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市场规模扩张，劳动分工水平达到更高的均衡。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劳动分工形成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水平上升、固定学习费用和平均交易费用下降，贸易产品种类增多，迂回生产链条加长，从而使市场范围逐渐由一区、一国乃至全球一体化。

2、模型

(1) 贝克尔和马瑞普模型 (Becker and Murphy, 1992) 及其修正

假定以团队 (team) 方式生产一种产品 Y, 每个人的时间分为专业学习与工作两部分, 个人生产率依赖于所获得的“通用知识”, 则有

$$y=Y/n=B(H, n)=AH^r n^\theta$$

其中, y 为个人产出, n 为团队规模, H 为通用知识, r 为知识参数, θ 为专业化参数。上式意味着产出依赖于可获得的通用知识和团队规模。

贝-马模型考虑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费用。假设协调费用决定于团队规模, 即

$$C=C(n), C_n > 0$$

则每个人的净产出为

$$y=B-C=B(H,n)-C(n)$$

一阶条件满足 $B_n \geq C_n$; 二阶条件满足 $B_{nn} - C_{nn} < 0$ 。

贝-马模型认为, 若对所有的 $n \leq N$ (N 表示市场规模), 有 $B_n > C_n$, 则劳动分工仅依赖于市场规模; 若最优 $n^* < N$ 时, 有 $B_n = C_n$, 则劳动分工由协调费用决定。

贝-马模型把劳动分工局限于团队生产内部, 因而得出劳动分工由协调费用决定的结论是极为片面的。如考虑市场、企业间的分工, 则协调费用只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而贝克尔和马瑞普也承认, 知识的深化, 使专者越专, 增加了协调费用, 同时也增加了学习费用。所以, 某种程度上知识增量与交易费用成正比:

$$\text{令 } C=f(H),$$

则贝-马模型可修正为

$$y=B-C=A[f^{-1}(C)]^r n^\theta - C(n)$$

假定一定时期人口不变, 则个人产出或专业化水平乃至整个社会劳动分工水平可由交易费用的变动解释, 从而与前面对新兴古典分工理论的阐释一致。

(2) 杨小凯动态均衡模型 (1998, 第 475 页) 及其修正

杨模型使用如下效用函数

$$u_t = \prod_{i=1}^m (x_{it} + K_t x_{it}^d)$$

x_{it} 代表 t 时期的商品, d 表示售卖, m 表示消费者-生产者数目, K 为交易效率系数。杨假定 K 随贸易伙伴数目增加而下降, 即 $K_t = k/n_t$, 而 k 是一个与制度环境或交通条件有关的参数。

如前所述, k 实际上仍不是一个内生变量, 而交易效率也不是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修正: 令 K'_t 为制度供给, k' 为制度供给参数

$$K'_t = k' / n_t$$

前面说过，给定利益集团人口、政治参数和资源相对价格，则交易费用决定了新制度的供给。所以，

$$k' = \rho / C, \quad \rho \text{ 为给定的参数, } C \text{ 为交易费用。}$$

显见，交易费用 C 随贸易人数的增加而上升，故：

$$C = r n_t, \quad r \text{ 为参数。}$$

$$\text{所以, } K'_t = k' / n_t = \rho / (r n_t^2)$$

K'_t 作为制度供给与 n_t 的反比关系不变，可保证方程取得均衡解，并内生了“制度供给”和“交易费用”变量，使贝-马模型与杨模型在用交易费用解释分工水平方面取得一致逻辑！

二、命题

命题 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证明：

按照杨格的思想，分工可从三个侧面刻画：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和迂回生产链条上的产品种类数。迂回生产方式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多种中间产品和应用工具来间接地将原材料变成终端产品，迂回生产链条越长，产品数目越多，分工就越是细化。

假定生产函数为

$$x^p = x + (1-k) x^s = l_x^a$$

x^p 为产品 x 的产量， x^s 为其售卖量， l_x 为投入生产 x 的劳动份额（表示专业化水平）， k 为交易费用系数， $a > 1$ 为专业化程度参数。易见，

$$dx^p / dl_x = a l_x^{a-1} > 0, \quad d^2 x^p / dl_x^2 = a(a-1) l_x^{a-2} > 0;$$

$$l_x^a / l_x = l_x^{a-1} > 0, \quad dl_x^{a-1} / dl_x = (a-1) l_x^{a-2} > 0$$

所以，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都随专业化水平 l_x 的上升而增加。

又设 $l'_x = 2l_x$ ，则 $x^p = l_x'^a = 2^a l_x^a = 2x^p$ 。可见，专业化水平上升明显导致规模报酬递增。

假设产品种类数扩展到两类： x 、 y 。 y 为生产 x 的中间产品，则生产函数为

$$x^p \equiv x + (1-k) x^s = \text{Max} \{ x + (1-k) x^s, [x + (1-k) x^s][y + (1-k) y^s]^{1/2} \}$$

易见，只要 $y + (1-k) y^s > 1$ ，则 $[x + (1-k) x^s][y + (1-k) y^s]^{1/2} > x + (1-k) x^s$ ，迂回生产使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升。

所以，基于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会产生递增报酬。劳动分工水平的上升，表现为每个经济个体投入不同的专业生产程度加深，以及在原材料和终端产品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投入品或应用工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市场经济需要的商品化、专业化，却没有从“迂回生产方式”（roundabout production method）的角度来系统地看待这个问

题。命题 1 说明，只有不断加深经济个体的专业化生产程度，缩小生产范围，同时更多地利用中间投入品或生产资料，上下游产业之间协同发展，才能利用劳动分工的益处来实现经济发展。

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专业化经济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递增报酬会导致垄断吗？研究表明，市场选择的分工水平不会导致垄断。杨格指出，首先，人类所使用的各种资源存在抵制变革的惰性，新的规则或习惯的运用需要学习成本；其次，必要资本的积累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正如杨小凯所指出的，在“自由竞争、自由价格、自由择业”的前提下，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会自动协调到均衡水平，而市场会选择最优的分工网络（1998，第 108 页）。

命题 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证明：

假定存在两个完全先天相同、无任何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生产函数²如下：

$$\begin{aligned}x_1^p &= l_{1x}^a & y_1^p &= l_{1y}^a, & l_{1x} + l_{1y} &= 1 \\x_2^p &= l_{2x}^a & y_2^p &= l_{2y}^a, & l_{2x} + l_{2y} &= 1\end{aligned}$$

上式表明，两人均生产 x 、 y ，存在专业化经济，时间约束相同。我们有：

$$(x_i^p)^{1/a} + (y_i^p)^{1/a} = 1, \quad y_i^p =, \quad x_i^p, y_i^p \in [0, 1]$$

$$dy_i^p / dx_i^p = -a[(x^p)^{-1/a} - 1]^{a-1} < 0, \quad d^2 y_i^p / d(x_i^p)^2 = (a-1/a)[(x^p)^{-1/a} - 1]^{a-1} (x^p)^{-1/a-1} > 0$$

易见，在完全相同的生产函数下，一种产品对另一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递增，越是专业于某种产品的生产，越能获得递增报酬。若两个经济完全专业化，各自生产一种产品，则贸易使双方得益。这一命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完全相反，而这也许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最大贡献。

命题 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放松假设，经作者修正后的贝-马模型为

$$y = B - C = A[f^{-1}(C)]^{\tau} n^{\theta} - C(n)$$

当 $B_n > C_n$ 在 $n \leq N$ 处取得时，劳动分工仅取决于市场规模；当 $B_n = C_n$ 在 $n^* < N$ 处取得时，劳动分工由交易费用决定。

2 这一模型参见杨小凯（1998，第 50 页）。

如前所述，交易费用、经济制度、分工水平相互决定。在一定时期，人口、制度是相对不变的。这样，若一区域人口少于最优分工水平所需，分工水平将受制于人口规模。除非制度供给使交易费用足够的低，当一区域人口难以容纳很高的分工水平时，区际贸易乃至国际贸易将发生。而与之发生贸易的经济必定是经济制度效率相似、交易费用也较低、空间上比较临近的区域。我们很难想象，在距离遥远、经济环境大相径庭的区域之间会发生高水平的贸易往来³。而临近可贸易区域的产生，必定是本区域分工链条的延伸、学习效果、空间距离短和习俗相似等因素引致。所以，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经济进步应该是由某个中心城市或某片经济活跃地带推动，一波接一波地向临近区域不断扩散的过程。作为“增长极”而散布于各地的某些中心城市若没有足够的人口规模和高效的制度供给，虽然仍可能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但速度有限、潜力不大。

三、区域分工抉择

杨小凯（1998，第 473 页）证明，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生产率低，人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人力资本，能够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新的制度供给开始出现，使整个社会分工水平上升，进一步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能够支付起更高的交易费用，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制度供给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社会进入减速增长阶段。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各区域经济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

1、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

本文所指的“区域”泛指一个地区，一镇、一县、一市、一省乃至如珠江三角洲这样的经济带。欠发达区域高效率的制度供给少、交易费用高，阻碍了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反过来低水平的分工又限制了制度创新和交易费用的降低。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是欠发达区域落后的原因和结果。我们按人口规模、地理交通条件进一步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

（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拥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例如 10 万以上）且交通便利、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客观上具备了提高分工水平和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根据命题 2，此类区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在劳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重点是延伸迂回生产链条并增加链条上的产品数目。

因为此类区域实际上可以再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选择不同的专业方向，则整个区域经济就能获得分工经济。也许唯一重要的就是根据市场需求选准合适的分工网络。这个分工网络使每个子区域专业于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并且生产的迂回链条足够的长，中间产品、投入品或应用工具足够的多。通俗地说，就是产品要能深加工，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性强。

3 有人会举中美之间的贸易来反驳，但实际上中美贸易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发生贸易的跨国公司作为经济体实际上也是制度、效率、实力相当的。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兴盛就是一个典型。拉城地处广袤的荒漠，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禀赋优势。但它恰当地选择了赌博这一具备强劲需求的产业分工方向，围绕赌博大力发展了旅游、餐饮、建筑、娱乐、会展等相关产业。这些相关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互为补充、相互依赖的一张分工网络。中国的澳门、中关村，美国的硅谷、华尔街、好莱坞在区域分工模式上莫不如此。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此类区域选择分工网络的主要途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在先，民间自发的诱致性变迁跟进。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明证。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福建与内地省份相比并无明显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带有强制色彩的乡镇工业化政策却曾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广东南海市南庄镇为例，八十年代南庄只有很少几家建筑陶瓷工厂。少数先行者获得丰厚的赢利直接刺激了当地政府要求“村村办企业”的土政策，这为南庄建陶生产的规模化、集聚化奠定基础。南庄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建陶生产基地之一。在经济实现起飞后，政府的作用则应相对淡化，主要是为市场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创造条件，尽量降低制度再创新和市场运行的交易费用。此类区域的分工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出现迈克尔·波特所指的“簇群”（clusters）（波特，2000）。所谓簇群，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簇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紧密协作的产业和其他实体。美国加州的酒业簇群、马萨诸塞的医疗设备簇群、意大利的皮革业簇群实际上都是一个严密有序的分工网络。

（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同时也因为居住分散，不利于新思想、新信息的传播，所以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在劳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其次才是延伸迂回生产链条。

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但由于广大农民暂时难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所以人口集聚的程度有限，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分工经济来投资于农业和农村的改造尚需时日，制度创新、分工演进、学习效果是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融资、信息、税收、法律、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服务。政府即便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具备较长迂回生产链条的产业群，即农产品分工网络。这样的分工网络，稳定性强，更有利于本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可以为更高的分工水平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以便为将来的工业产品分工网络提供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

以江西东南某县为例。该县盛产甘蔗，但农业仍为主导产业，可以甘蔗为核心发展一个如下分工网络。

（因显示困难，故略去！）

这个分工网络的好处是原料易得，加工地不必完全集中，产品种类多，本地市场规模大，需求稳定，整个网络的重复利用和再生性强。

另一条途径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后者说是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因为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例如，此类区域A可选择林业资源丰富的临近区域B为协作区域或领头区域，A区域可为B区域提供砍伐、运输、加工、销售等服务。一定时间后，B区域以林业的培植为优势，A区域则以林业的深加工和销售为专长，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为今后自行选择分工网络打下基础。

（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由于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在劳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并且专业于某些分工链条上的产品生产或配套服务，朝“小而精、小而尖、小而专”的方向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后，此类区域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甚至外国进行贸易往来。浙江温州的某些小镇专门为外省或外国公司生产一些细小的零部件而得以繁荣，就是因为不断加深的专业化减少了学习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并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引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欠发达区域的地方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角色，不要随意“替民作主”，动辄“规划产业”。许多政府大搞特搞的所谓“富民工程”、“示范基地”、“工业小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本地生产力落后，专业化水平低下，产品想在外地打开市场，融入当地较高水平的分工网络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互动的前提是同一水平的技术、制度平台。

2、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

按照新兴古典分工理论，最优分工网络是由市场自发选择的。因此，对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经济来说，是不存在所谓区域产业政策的。对发达区域而言，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专业化水平起决定作用，迂回生产链条及其产品数目将随专业化水平的上升而融入或构建不同的分工网络而变动。专业化水平越高，可选择的分工网络就越是多种多样。

但由于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国市场因为户籍制度、地方分权、保护主义等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制度所割裂，发达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整个市场的一体化困难重重。根据命题 3，发达区域的分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若不能从欠发达区域吸收到足够的高素质劳力，则区际贸易或国际贸易将发生。进行区际贸易时，实际上可贸易对象主要是那些分工水平、制度环境相近的临近区域。当区际贸易仍然难以容纳高水平的分工网络时，国际贸易才发生。国际或国内区域间竞争的关键不在于优惠的政策，而在于能否提供完备的法律服务、良好的交通条件，开明的意识形态，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特别是经济组织的创新提供服务。在创新过程中，市场会自发选择更加合意的分工网络。没有经济组织的创新，就没有分工演进而只有学习效应，经济就会减速增长。

我国东南沿海先富起来的区域，很多都是外向型经济，与内地之间的互惠贸易并不多，内地只是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分治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加之内地制度供给水平低下，交易费用较高，使沿海与内地缺乏贸易扩展的条件，这同时还限制了沿海发达区域的持续高速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集权主义传统的国都而言，无论是欠发达区域还是发达区域，政府都要避免直接卷入微观经济活动，更不应与民争利，而应把精力集中于提供好的制度供给，改善法律服务和交通条件，保障私有产权，尽量降低交易费用。

诺斯和托马斯（1999）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明确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他们用史实证明，法国和西班牙在 16 世纪以后江河日下，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发展有效的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如允许人口、资本的流动，奖励技术发明和创新；而荷兰和英国的崛起正是因为发明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可见，对于劳动分工而言，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第一

生产力，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竞争的实质是制度的竞争，那些不能提供更好的制度从而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将在未来失去竞争力。

四、小结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分工水平、制度供给、交易费用、市场规模之间相互决定、相互依赖的自发演进过程，并将这一理论首次应用于区域分工模式的抉择，分析了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应选择的分工网络。

本文的理论还可以解释下列问题：产业政策的作用日渐式微，是因为劳动分工、经济增长主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政府应致力于高效的制度供给，降低交易费用，如废除户籍制度、消除行业垄断，而不是“规划产业”；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放慢的原因，是因为人口规模的限制，处于只有学习效果而少制度变迁的成熟经济增长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分工水平低，新兴工业迂回生产链条太短，制度创新少，交易费用过高；国际贸易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逐步转向发达国家之间，是因为发达国家有相同水平的交易效率、分工网络和制度环境。

聂辉华 2002 年 1 月 31 日初稿于江西崇仁

2002 年 2 月 1 日二稿

2002 年 3 月 6 日三稿于北京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科学》2002 年第 3 期，发表时题目为《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有删节。

参考文献：

- 1、Young, Allyn A.(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vol.38, pp.527-42.
- 2、Becker, Gary S.(1965): “A Theory of Allocation Time”, *Economic Journal*, vol.75, pp.497-517.
- 3、Becker, Gary S. and Murphy, Kevin M.(1992):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CVII, pp.1137-60.
- 4、Stigler, G.(1951):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59, pp.185-93.
-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 6、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 7、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版。

8、迈克尔·波特：《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成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

9、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10、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11、林毅夫：《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

New Classical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hoices of Region Division of Labor

NIE Hui-hua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100102)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key factor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interior relations among division of labor, supplying of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market extent with the applying of New Classical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Furthermore, with this theor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best network of division of labor for different reg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By doing so, the author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slow development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Keywords: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regional economy

来源:[白鲨在线](http://www.baisha.126.com) <http://www.baisha.126.com>